

魏晋南北朝隋唐略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何德章 杨洪权 柳春新 著





205008454

C934

14-4

晋南北朝韬略

何德章
杨洪权
柳春新
著



0A027/06

500845

C934

14-4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韬略/何德章等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8

(中国韬略文明丛书)

ISBN 7-5354-1612-8

I. 魏… II. 何… III. 谋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C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794 号

责任编辑:田扬帆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5837121)

印刷者:崇阳县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 10

版次: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SBN7-5354-1612-8/I·1275

定价:14.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魏晋南北朝数代整个儿是一个乱世，但在中国文明史上它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人的精神觉醒的时代。因之在精神上它对后世有特殊的影响，而读书人的保全自身的智慧和政治家、军事家的文韬武略就是其中重要内容。

三国战争是魏晋韬略的开篇也是魏晋韬略成就的顶点，众多的政治与军事天才风云际会，推出两位杰出的人物，曹操与诸葛亮，无论是作为一代枭雄还是作为千古完人，他们影响民族精神都是深远的。其言行无论是从恶的意义上不断受到道德的批评与谴责，或是从善的意义上不断受

赞扬，但文韬武略说到底是为功利而存在的，因而他们的行为也就在后来的历史中被反复模仿。这样后来又有王猛和谢安作为隐士的飘逸，乃至出将入相的战胜攻取、得心应手。

而就谋略的品质言之，无论阴谋还是阳谋说到底都是阴谋，因此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都是一个阴谋得势的时期，于是作为一种效果，读书人的韬晦之术也开出特殊的精神之花。但无论如何，在人的生命力，这是一种抑制与扭曲。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北方民族强有力的奋起，中原古老的韬略遂呈现一种新的意韵。

本书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再现这一代文韬武略运用，更显示这种文明的魅力。

关于韬略文明

●扬 帆

1. 也许韬略文明叫谋略文明更合适些，但我还是选择了韬略这个词儿。这是为什么？大概是因为谋略更为人所熟知，而韬略则仅限于军事，所谓太公兵法“六韬”也，黄石公兵法“三略”也，但军事之韬略为何？政治家说，军事是政治的一种极端形式，是流血的政治。而政治又是为何？为了老百姓的一定的精神文化与经济生活。这样说来，韬略实际上就是谋略，只是用于军事之谋略就更为典型了，这只要看古人对这几个概念的语义诠释就明白了。

韬，《说文》：“韬，剑衣也，从韦，舀声。”这是韬的本义和第一个读音。韬是剑衣，或者说叫剑套、剑筒，牛皮制的。它不是剑，不是武器，但它是包藏、保护武器的。这样它不是武器，却在武器还没有及时发挥它作用的时候它与武器同在，是武器的一部分。然而较之武器的威慑力，杀伐气息，也许它又要温和得多，或者它的面目未免太平常了，这大约就是韬的品质。而就武器作为手段的意义说，最根本最彻底的武器莫过于人了。人是人

的手段，人是人的目的。而中国儒家标举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既把手段和目的合而为一，又把武器的形式推向极至，但这终究是不得已的事。保护人，保护现存的利益总是手段存在的理由。这样，给人以保护，给人的目的以保护，乃至人的保护自己的手段也给以某种伪装，这就是韬的本义的稍稍扩大了，这就是它作为军事学最初与最彻底的意义了。这里实际已涉及许多问题了，在这里我们无暇顾及，但一个最突出的内容却是我们不能不说的，这就是韬对于人作为手段的心理特性：谋。

谋，《诗经·小雅·皇皇者华》有句曰“周爰咨谋。”毛传解释说是“咨事之难易为谋”，所以《说文》也训释说“虑难曰谋”。这于中国哲学更为权威的经典中佐证更多。“君子以作事谋始。”（《易经·讼》）“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尚书·大禹谟》）谋的意义可谓很明确了。所以，韬的内容之中最为切实东西就是谋了，不仅如此，韬既给行为一种外表，那么韬实际也是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再就是略。《左传·成公二年》：“兄弟甥舅，侵败王略。”杜预解释说是，“略，经略法度。”所以《广韵·释诂一》说“略，法也”。所以清人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说，“略，引而申之，则法度所经画者皆曰略，所谓王略，文武之略是也。”进一步就是智计的意思了。《汉书·司马相如传》“观士大夫之智略，均猎者之所得获。”颜师古注“略，智略也。”合此二义，观后来人于略理解与运用，大抵就是智计之法，智计之道了。

综上述观之，为了一种目的，用心筹画，尽智计之能事就是谋略了。用于军争的就是韬略了，而用于兵争的又非最终是为兵争的，正如毛泽东批评的“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所以韬略也是谋略,是谋略的一种,或者是更为典型的一种罢了。所以,我们就取其典型这一点为丛书名之。

当然,于谋略或者韬略,还有一个理解的问题。有人认为关于谋略的理解不可泛化,谋略就仅指军事战争上克敌制胜的道法,其余事体的运筹策划的行为和方法是不能称为谋略的。而所谓韬略其确切内涵就是六韬三略了,亦不可作一般运谋设计的指称。应当说这是不妥的,我们不取这种看法。事实上无论军事谋略,还是政治规划和策略,或是经济设计和商战谋划,乃至一般人们生存心计,莫不经一心运筹,不同的只是对象,然而却无一例外的取同一品质:调动能量,区分难易,及为了确定的目的而趋利避害。这样它们即便不是如军事谋略那样典型,但无疑存在着丰富的谋略思想,亦为历史积累了丰厚的谋略遗产。退一步如前所说,即使谋略是为军事的,但从来就没有单纯的军事,它总为着一种目的,要么为了私利,要么为了国计民生。而军事虽有所不同也并不是因为它的对象,而由于它的影响,所谓“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且更迫切,更明确,其余成败影响没有这么明显罢了。相反从知识的影响言之,正是由于人生诸多方面的谋略准备,才使军事谋略获得更多的精神营养。再倒过来,军事谋略从来也在如影随形地影响着人们谋求种种事功。

再,语言之于存在总是“名可名,非常名”了,重要的是存在的一种道。固然,道也是“道可道,非常道”,重要的是存在本身,而于人实在不过是,神而会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已。而谋略恰是实践性极强的心理运动和行为,所以这里,关于韬略文明实不过姑妄言之,这样说亦见行难知易,行重知轻了。

只是倒过来一说，知且不明，出门不知方向道路，又如何到达目的？所以知亦是不可忽视的。这或许是我们这一套《中国韬略文明》丛书的意义。

2. 当然，这里还有文明。何谓文明？文明，这是一个涵盖极其丰富广大的概念，与蒙昧野蛮相对者皆文明也。只是当人类进到文明之地步，为了利益，为了自身的某种目的，野蛮甚至蒙昧在人类身上有时也表现为一种文明的形态。从人类道德与智慧进化的意义上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但从人性的复杂上说，从手段的野蛮上说，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人类在其历史演变中确切存在的。所以，文明，撇开书生式的单纯与善良理解实不过是人类的一种生存实现的情景。而于此情景，最为活跃，最见人之才情，最引人注目，最见功利得失，最为正人君子所谴责、所诅咒，又为更多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最见人创造历史活力的也常常就是韬略或者说谋略。它造就了无以数计的英雄豪杰，同时也造就众多奸佞欺诈之徒。在这里，常常又有英雄换一角度就是歹徒了。果然如此，魔道相生，确实难说究竟。正因为这样，我们不想单纯的只谈韬略或谋略，而更愿从文明的角度，文明的层面去看韬略，看人类智慧的丰富，智能的神妙，也看人类的品性的丰富与复杂。这其中不只是军事的，更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人性的、人格的、理想的、功利的、伦理道德的，如此等等，从中见出人类的一个侧面。

这里，文明是要紧的，这是我们认定的一种人的角度，人的视野与人的内容，我们所尽量企求领略与表现的一种历史意韵；但谋略在这里又是更为基础的，且与读者或者更为关心。但我想，我们不想把读者带进一种纯智慧的迷宫，相反则期望能站得高远些，明达些，于谋略，于民族文化，于历史文明，看到更多一点的理想光彩，这就是我们对谋略的良知审视。不仅是操作方法的描述，历史过程的描述，个中理论的阐发，及至对人的智慧之光的欣赏，而且尤其要注意道德的评价与理想的选择。这或许是更为全面意义上的韬略文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说谋略面目精神。

谋略是为人的生存发展而存在的。从人类于草昧洪荒时代求生存，到文明时代的军国大业与个人生活事业，莫不要对环境作出经一心运筹的反应。这个运筹就有谋略了。一般情况言之，尤其是于个人事体，这种运筹是无所谓的，但于关键处，于军国大事就要紧了，荣辱、成败、兴衰，即在其中矣！这就是谋略的必要性了。这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军事，尤其于一场战争。所以，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为察也。”事实上，战争并不是每日每时的事，但于生存与发展却是人之世界常有的事。因之，于社会的人，谋之则兴，不谋则衰；谋之则有所成，不谋无所成，或饱尝失败的痛苦。这就是谋的重要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兵者，人也；兵法者，说到底又有一种人之生存与发展之理论的品质了。个人如此，何况国家！所以诸葛亮评汉末曹操与袁绍两大军政集团的兴衰存亡即为“不惟天时，抑亦人谋”。

3.

而所谓谋者本性上是一种纯智慧的活动，是一种心理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心思如行云流水，无方法可说，无行迹可述。一旦堕入成法与成迹，刻舟求剑，难免如战国之赵括纸上谈兵，害国害民亦误自身了。但于历史文明总是前车之鉴，后车当戒，总是前人开路，后人行车。因此，我国历代兵书数以千计。而中国又以史立国，且中国史者，无论官修的史册，还是私人著作，几乎莫不有《资治通鉴》的品质，写人事兴衰，见成亡之道，让历史本身说话，见一种治国治军思想，乃至一份人生的魅力。这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历史的一种读法。自然，这一切到底是过去时的，它只提供一种参考，提供一种借鉴与启示。尽管它必然地包藏了无以数计的智谋珠玑，但识得与用得者还在个人。这就是各人的心智作用了。所以，明人刘寅告诫：“读兵书，要活泼泼地，如珠走盘中，无一定之理……读兵书，要知变。但知常而不知变，犹刻舟求剑，何益于事？”（《武经七书直解·读兵书法》）此非读兵之法也，对待一切成法之态度也。但尽管如此，成法并非教条，范围总是有的，对此最精当的大约莫过于《孙子兵法·始计第一》说的：“经之以五事，较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对此孙子有具体的解释，概括起来说，即谋事者应对所谋对象，或者说自己要达到的目的，作一种从社会到自然的全面把握。这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不可疏忽，而尤其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就是谋事主体的修养与作风了。这是要紧的，但也是最容易被疏忽的。因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老子·三十三章》）或者说，对客观的把握，正确地把

握主观则是必然的前提，只有能真正战胜自己的人，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致于“自胜者强”的境界。

再就是谋略的目的论和风格。从目的论上说，必要性也就是目的论，但目的论又有一个风格问题。谋略无论是为了战场上的克敌制胜，还是一般和平时事业事业的争取功利，谋略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确定的。战争是为了和平，是以战去战。发展自己也决不意味着葬送别人，这就是要严格地把握度，明智地克制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到了现代，世界越是感到人类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甚至社会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到现代人类的和谐理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越来越重要。这样，一方面“穷寇勿追”和“务使穷禽入网罗”是一个不断被讨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第三》）这是一种风范，又是一种境界。又一方面，尽管政治实体，经济实体总是极力标榜和平友善，竞争乃至争强好胜实际又必然是人性的确定存在。这样，人际，实体之间，乃至国际超越别人同时又必须容忍他人，借助他人，依赖他人，又成为谋略者必不可忘记的问题。同样，这既是一个问题，一个对象，又标举着风范与境界。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急功近利，极端偏执，后患或者并不遥远。

4. 与此相联系的是谋略的选择问题，也即谋略中功利与道德的矛盾冲突。这是谋略者必然遇到，也必然要顾忌的问题。因为就谋略者而言，为了需要或目的，不择手段，或无所不用其极几乎常是一种历史性的必然现象。这里说的尤其是军国大事。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就是合理，尤其于胜利者。这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无论道德评价或伦理选择既表现为一种无奈，同时人的良知又必然历史性地树立一种决不倾倒的标尺，即：善与恶的评价。也就是说，在相对的历史阶段和绝对的生命过程，总是出现这样的文明悖论：历史无是非，人间有善恶。或者说胜利者就是伦理就是道德，但从来就没有永恒的胜利者。而就强权的意义上讲存在就是合理。相对与辩证的理解就必然是改变这种存在，本身也意味着存在就是合理，也就是历史的进程，或事情的因果恰恰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这就是胜利者败于自己的胜利。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诸如商鞅的一系列军政设计与行为，秦始皇的酷烈政治手段，赵高的指鹿为马，曹操的雄才大略与放纵心术，隋炀帝的谋位与失位，明太祖的病态心理与特务政治，如此等等，一时良知何在，评价何如，结局是因为什么？终极的回答似乎并非渺然。因之，就历史看，生存与发展要求，谋略是必要的，但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也是必要的。所以，这与谋略者言之就有一个等次了，这用兵学的语言说就是孙武、吴起的权诈之兵，齐桓、晋文的节制之兵，商汤、周武的仁义之兵。这就是谋略的度与谋略的等次与境界了。而“贼是小人智过君子”现象是不能不正视的，而于中国韬略文明，君子与小人之争也成了中国文明历史的一种风景。所以，明末人袁崇焕说：“心术不可得罪于天

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一代名将是为何？心术者，谋略大概可算得典型的心术了。

所以，之于谋略的逞尽心智于手段极端，一种返朴归真的存在就显得特别让人寻味了，即大道无谋，大谋不谋，或如道家人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庄子·齐物论》），或如儒家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所以先哲告诫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这就是无为而为，不谋而谋的效果。历史就常常这样写着。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韬略上升到文明的层面上去观照，并标举某种理想的原因。也因此于谋略说来，一种于民大利的学说与政治方针，一种良善的历史观、人生观，用实用的眼光看，有时它们也有相当程度的谋略的品位，但它之影响又常非一具体的谋略可比，或曰大谋不谋了，这又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谋略上升到文明的程度上谈的又一重要原因。

所以，也就是在这一根本意义上说，谋略作为手段的特性就充分明确了。手段是为目的的，目的是行为主体的。而主体的谋略说到底是在人类历史文明的一定阶段发生的。假如谋略主体的存在对历史文明就是大逆不道的或者说在功利上是危害民众的，那任其诡计多端，也必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清之慈禧太后那拉氏，袁世凯谋洪宪皇帝，绝不是计谋不当，恰恰相反，在谋略上他们还可以说是相当老到的。但历史潮流取舍明确，一时心术得逞，岂可救必败亡之气数。如此，也是大道无谋的另一重解释了。

当然，关于这一点，也许使我们对我国韬略文明其操作方向

可作一带根本性的反思。我国历史上的韬略操作，其争利者基本上是在人际间进行的，而于人在自然方向的争取与开拓生存空间，就明显地显得步履徘徊。而在充分认识人这一点上，稍有思想火花，也即被“王道霸业”所扑灭。这一后果其影响就是近代以来，使我国的某些方面明显落后于世界潮流。这是不能不警醒的。

5. 末了，关于韬略文明这套书，还想补充几句，书中见仁见智，可能不无作者一些见解乃至来自历史沧桑的若干体验，但这所有不是说写这套书的我等果然了然谋略了。恰恰相反，我等皆不过纸上谈兵耳。前面说过，中国以史立国，果然生活与读史有所得，读者还是神而会之，或有真得也。如此，我等的未睹说一气就心安了，至于方家不吝赐教，更是我等敬谢不敏的。

权作开头语

1997年2月28日

于黄叶村广济居

前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在近四个世纪中，先后出现三四十个政权，其间仅西晋时有过二十多年相对安定的统一时期，仅十六国北朝黄河流域就出现了三度分裂与三度统一。每一个政权的创建与衰亡，自然有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方面的必然性，但人的活动亦即这一时代政治家、军事家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容忽视。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历史背景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氏兄弟力图“限江自保”、诸葛亮则辅佐刘备“跨有荆益”占据西南，形成天下三分之局；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许多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以及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勾心斗角，都无不需要计谋的运用，处处闪耀着韬略的火花。可以说，长达四百年的动乱，给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提供了运用智谋的舞台，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座谋略的宝库。

任何一个计谋或政治军事策略，总离不开当时实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的、民族的实际背景。我们在叙述这一时期的韬略文明时，对各个计谋产生的具体背景与实际效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当然，魏晋南北朝毕竟是中国历史中上承两汉

下启隋唐的特殊历史时代，这一时代的谋略家们从两汉先秦的文明中吸取了智慧，他们的谋划也往往要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同时，他们的谋略有的也会对以后的历史时代产生影响，对此，我们在具体叙述具体谋略时，也给予了足够的注意。

本编系由三位作者共同完成的。柳春新执笔曹魏、东晋部分，杨洪权承担了三国中蜀、吴部分并西晋十六国南朝部分，何德章负责北朝部分。在写作中，三人尽可能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但由于各人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文风不尽相同、学力有所不逮，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书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基本上作到了各尽所能，不少地方属于个人研究心得，没有像时下不少“大作”那样抄抄捡捡，拾人牙慧，庶几可免“烦简牍，疲后生”之讥。读者诸君察之。

何德章

1997年仲夏于珞珈山